

#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人文价值

畅引婷 邱晓星

**[摘要]**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所具有的人文价值,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为人类所提供的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技术,也有别于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的改变,它关注的重心是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以及人的文化生命活动的价值体认。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入手,探讨女性文学、妇女史学、女性哲学、性别教育等学科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价值,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思想文化观念再造的行动或运动,是知识生产领域的一场变革,即通过一定的思想和行动,改变两性之间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以及不平等的性别观念,进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

**[关键词]** 学科建设 女性文学 妇女史学 女性哲学 性别教育 人文价值

**[作者简介]** 畅引婷,《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编审、硕士生导师;邱晓星,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人文科学研究具有人文价值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但什么叫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究竟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妇女研究与人文科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妇女学的人文特性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妇女研究中是怎样被体现出来的?妇女研究与传统文史哲学科的结缘其人文价值是怎样实现的?传统学科乃至人的观念在妇女研究的作用下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不仅是妇女研究及学科建设本身向纵深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实现效用最大化所必须的。

## 一、人文科学的特性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sup>①</sup>,不仅为人们认识自身和社会提供了思维的框架和思考的路向,而且为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境与难题提供了解决的路径和缓释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妇女解放路径的特色研究”[项目编号:11BKS076]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69页。

方法。三者既联系又区别,各自在自己相对独立的界域内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人文科学在“科学研究”的分工领域,主要担负着“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或“重建人的思想家园”的神圣职责,它关注的是人的文化生命活动及其历史过程。具体而言,人文科学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技术,而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守护一个精神家园,使人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在现实的世界里,不论国家/地区,不论种族/民族,不论阶级/阶层、不论性别/年龄,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知识和学问的建构与习得找到真正的“我自己”,提高个人对生命的感悟能力和自身的生活质量。

与自然科学研究所遵循的“客观性”原则相比,人文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或“价值倾向性”。它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严密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对研究假设和研究结论反复进行验证,但它与现实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情境下出现的各种“论辩”或“争议”,不仅能够激活人们的理性思维和无限的想象力,而且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更加开放,并通过对人的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来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相比,人文科学研究关注更多的是“观念性”和“思想性”的东西。前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后者具有显著的易变性或难变性(瞬息万变或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说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性别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的话,那么通过学术争鸣和学校教育对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则截然不同——要么在一夜之间就能与时俱进,要么历经千年也不能有所撼动。人文科学的这一特性充分说明,一个人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既是长期的、艰巨的,也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的进步与落后,不仅可以左右一个人对周围人与世界的基本看法,而且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权力和利益关系。

总之,不论“科学”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它都

是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者的“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学术研究或学科建设的任务,不只是生产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将所生产出来的有用的或有效的知识在更为广大的民众中间进行传播;学者们不仅传授知识,而且传播理念和意识,进而将知识和意识内化为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即在日常行为中通过对自身的认识、改变与提升,全面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一点,对于人文科学来讲尤为重要。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在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使人类/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话,那么,人文科学研究最终带给人们的将是思想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愉悦;如果说社会科学对人的关怀是从外而内,即通过国家权力和制度的变革来规范、建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么,人文科学对人的提升则是由内而外,即通过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来对人类社会进行重新认识和建构;如果说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进行制度性改造受制的因素较多,有时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还要流血牺牲的话,那么运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即通过“单个人”路在脚下的具体行动,以及日渐形成的燎原之势,改变一切落后的观念和行为习惯,进而提高全人类的生命质量。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依托高校已经形成的学科门类进行“观念的再造和行为的改变”是一条较为便捷的途径,因为在高校的每一个人文“学科”似乎都与“育人”有关,即培养现代公民应该具有的各种意识和观念,包括性别平等意识和观念。因为,不论研究还是教学,最终都要落实到对“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培养上面(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落脚点)。具体到妇女与性别学科,就是运用妇女与性别研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和“学问”,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途径,大面积提升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敏感度,并自觉抵制各种性别歧视的观念和行为。说到底,妇女与性别研究和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思想文化观念再造的行动或运动,即通过一定的思想和行动,改变两性之间各种不

平等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以及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进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and 良性运行。

## 二、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人文价值

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纪中期以来,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目前已经以独立的身份跻身于众多学科之林,并在知识生产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也步入了学科发展的快车道,但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即“缺乏一种起于民间的强大的妇女运动从而牵动和推动理论的需求,并成为理论探索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思想的资源的背景”<sup>②</sup>。因此,中国的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在借鉴西方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在高校既有的科系、学院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分别将“妇女研究”纳入现行的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体系之中<sup>③</sup>,以女性文学、妇女史、女性哲学、女性社会学、女性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名分在学院生存,一方面丰富传统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从不同的学科层面为新兴的妇女学科逐步积累相关的成果;二是明确打出“女权/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旗帜,试图在颠覆、改造传统学科知识生产体系的过程中,确立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在高校的独立地位,即便不能以独立的院系体制存在,也要将批判和挑战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体系作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或基本特征,而不是以传统学科框架为基础将“妇女与性别”研究添加进去。但不论以何种方式存在,不可否认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进展,一方面借助体制内主流学科历史和现实的诸多“资源”(包括人与物),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的发展扩充地盘,聚集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和教学内容的更新,将有关“女性主义的”和“社会性别的”知识渗透其中,以逐渐消除传统知识生产体系中的“性别盲点”和“男性中心”,进而实现知识再造与人才培养的宏大理想。尤

其是女性文学、妇女/社会性别史、女性主义哲学和社会性别教育等学科的发展与壮大,不仅开拓了人文科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共同为当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一) 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

妇女学学科建设在中国的兴起如果从 80 年代算起,至今已走过了 30 年的发展历程,从李小江、邓伟志等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妇女学学科,到 90 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再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建设在高校的全面推进,各种具有“启蒙”性质的关键词汇在妇女研究中开始反复不断地出现,如女性意识、妇女意识、女权意识、女性群体意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自我解放意识、性别平等意识、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关注弱势群体、维权、赋权、充权、平权、发声、言说、颠覆、改造、批判、反思、本土化、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公平、公正、正义,都对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它不仅使以女性为主体的妇女研究者逐渐改变了对男女两性的传统认识,而且先进的性别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也开始在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女性的经验和感悟出发,反思以往的父权/男权文化。二是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各种有关性别的概念/观念以新的含义。三是通过学术研讨、项目合作、中外文化交流等方式,在不同见解的论辩与交锋中开阔思路,拓展视野,激活

<sup>①</sup> 参见刘倪《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余宁平、杜芳琴主编《不守规矩的知识: 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余宁平、占盛利等译《当妇女提问时: 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sup>②</sup> 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sup>③</sup> 事实上,当今的人文科学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史哲范畴,涵盖了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各个专业。本文所论的人文学科,主要以文、史、哲、教等学科为主,但并不排除其他一些学科专业所具有的人文特性。

思想,开辟多元化的解放妇女的路径。

具体到每个学科内部,就是通过妇女与性别研究,激发人们改变现实性别不平等状况的热情和斗志。如在女性文学领域通过对古今中外大量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读,揭露、抨击隐含其中的男权传统文化规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同时通过女性主义批评试图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以及人们的性别观念产生影响。正如刘思谦所说“女性与女性文学,和人性的完善、个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和平、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观同命运,和人文主义价值即人的解放的全面实现同命运。”<sup>①</sup>在妇女史研究领域,通过对古今中外历史文本中妇女“失语”或“缺席”状况的批判,以及对妇女“受压迫”的事实和妇女们抗争经历的描述,试图唤起人们对当今男性中心的改造和颠覆,同时确立妇女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女性主义哲学那里,是对古今中外男性思想家、政治家大量有关贬低妇女的言论的批判,对他们褒扬女人的见解的赞美,同时用女性主义哲学家已经进入哲学领域的铁的事实来颠覆人们对“女人不适合搞哲学”的陈腐观念,以便创造更为开放、更为平等、更为自由的思维空间,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在性别教育领域,就是通过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性别反思能力,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最终解构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减少甚至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借用革命导师的话说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因此,妇女/性别研究和学科建设首先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场革命,即通过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带动社会性别制度的全面变革,进而在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机体的良性运行。

(二) 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是知识生产领域的一场变革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不只是在高校开设多少课程、出版多少教材和著作、发表多少论文这些简单的量化指标,更重要的是看课程开设、教材和著作出版、论文发表的质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进入知识生产领域被知识共同体内的

同行所认可,进而使妇女与性别研究获得学理上的合法性。如果说80年代学者们心目中的“妇女学”更多是一种美好愿望,90年代的妇女学学科建设还多是因循西方而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真正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已经进入了实实在在的建设期,并在主流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其表现,除了表面上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课程、教材、论著,以及各级各类项目数量不断增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到了不同学科的内部或根部,探讨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基础。即便这一学科目前在高校的院系建制内还不能独立存在,它也不会或没有妨碍有志于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同仁对与此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原则进行深入而持久的探讨。

综观当代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建设,其创新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理论资源和各种“后学”的基础上,一方面赋予来源于西方的概念以“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赋予传统的“学科知识”以社会性别的普遍意义<sup>②</sup>,再一方面改变知识生产的“八股样式”,将女人们的经验通过口述和实证的方式纳入知识生产的序列。可以看到,随着女权/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父权制、男性中心、平等、差异、多元、交叉性(性别与国家/地区、民族/种族、阶级/阶层、性取向、年龄、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叉)、话语、权力、女性视角、性别经验、妇女解放、妇女发展、男性研究、解构、建构、重构、兼容并包,以及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概念范畴在妇女研究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对认知主体、他者、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理性、二元论、性别身份、性别气质、经验、立场、身体、公

① 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② 参见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赋历史以社会性别》和《引入社会性别: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杜芳琴主编《赋知识以社会性别》,以及王金玲、高雪玉主编《赋社会以社会性别》等妇女与社会性别读书研讨班专辑;郑新蓉《性别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乔以钢《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载《文史哲》2007年第2期;贺萧、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等等。

私、内外等核心概念的重新厘定,妇女与性别研究已经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通过这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和战略目标的不同,都使得妇女与性别研究这个新兴学科与其他学科严格区别开来。尤其是“妇女的+本土的”妇女学架构的提出<sup>①</sup>,不仅将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建设与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区别开来,而且与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潮划清了界限。值得强调的是,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学科以超越传统思维的方式质疑、批判历史与现实,进而构建新的知识生产体系和理论框架,不仅有益于妇女学科的健康发展,而且具有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具体而言,在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下和社会性别视角下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在高等院校和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传授与传播,人们看到的(将)是与以往不一样的“文学”、不一样的“历史学”、不一样的“哲学”、不一样的“教育学”,以及不一样的“社会学”、不一样的“心理学”,不一样的“政治学”、不一样的“法学”,乃至不一样的“科学”和“技术”。这个具有无限生机的新兴的学术领地,通过与主流学界的对话,与非女性主义学术的对话,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对话,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历史和未来的对话,与社会实践的对话,与男性的对话,与女性自我的对话,以及代际之间的对话和学科之间的对话<sup>②</sup>,都对当代中国的妇女与性别研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近十年来的诸多成果,少了些毕露的锋芒,多了些理性的思考,面对强大的男性中心文化和制度,“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多样性”、“策略性”、“战略性”等问题被提上日程。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研究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特定时空中的个人或群体,主观能动性的实现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规定性”,所以,在现存体制内“策略性”地生存,体现的不只是妇女研究者的聪明和智慧,以及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的实证,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促使有关研究成果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争取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实现研究工作本身的人

文价值”<sup>③</sup>。

(三) 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和学科建设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具体行动

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学科建设,不只是为了改变性别观念和建构性别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以改变了的性别观念和所建构的性别知识体系作为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础,指导人们对人类自身和社会进行改造,以便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更加公平与合理。因为,学科虽然是知识演进的结果,但学科知识不单是纯粹的知识论层面的事,更是一种社会实践。

首先,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学科建设作为开疆拓土的一项伟大事业,在高等教育的体制内和国家社科规划的体制内为其发展开拓空间。而利用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和公民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将具有学术潜质的性别课程引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之中,使妇女与性别课程在高校的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定位置,是许多研究者持之以恒的一种行动。其次,将课堂当做具体的实践场所,一方面努力践行女性主义的平等理念,通过女性主义教学法的应用,构建民主的师生关系,强调经验的平等分享与交流,重视学生的体验、感受、情绪、价值观念等与所学知识间的关联,积极建构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社会理解力和行动积极性,以争取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实现女性学研究的人文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校园活动或行动,在培养年轻一代自觉抵制各种不平等现象的能力同时,用学生的行动对女性主义知识进行检验、完善和修正,以便使教育内容和学生乃至社会的现实状况更好地对接。再次,以妇女与性别为研究方向的硕博学位点的不断增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妇女研究队伍和力量。据一些研究者统计,截止2010年底,全国历史学专业共开设相关课程62门,已有7所大学和研究所设立了6个硕士学位点和4个

① 参见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导论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肖巍、朱晓佳《国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2006—2011)》,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③ 乔以钢《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载《南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博士学位点。<sup>①</sup> 其四,从书斋走向社会,试图把妇女研究的成果向社会实践层面转化。如推动妇女研究学者积极参与与妇女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以研究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促进分性别统计,开展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状况评估,等等。<sup>②</sup> 再具体看,女职工的退休年龄问题、女厕所的蹲位问题、家务劳动的工资化问题、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等,作为“提案”在每年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反复被提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妇女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向社会实践层面转化。正如一些研究者反复强调的,“妇女学学者应该首先是人文学者”,要善于把学科和学术的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同时将公共知识转化为大众知识。“而真正促进民众积极变革和善于变革的知识策略,那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和学问。”<sup>③</sup>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是以主流学科中“分支”学科的身份出现或存在的,女性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属性,妇女史所具有的“史学”属性,女性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哲学”属性,女性教育所具有的“教育学”属性,都使得妇女研究与传统的人文学科难解难分。这种状况,既可能是羁绊,也可以是资源。而冲破羁绊、借助古老文史哲等学科资源,妇女/社会性别学科的人文特性将会充分显现。如在知识生产领域寻求“跨学科”的学术资源时,我们曾听到诸多“不一样”的议论:有人说,所有的研究最终都要归结为“哲学”,因为它对来源于现实生活中诸多现象或问题的“高度抽象”和“高屋建瓴”,可以使人们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达致“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认知效果,在看到树木的同时也能看到森林;有人说,所有的学科最终都要归结为“文学”,因为文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没有任何一门学问对现实社会以及人类活动的褒扬、揭露或鞭挞能像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能有如此众多的受众,以及它在感知人类情感世界的全域、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方面所独具的“润物细无声”作用;也有人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历史学”,因为无论人与社会,还是为了探究人与社会而滋生的各种各样的

“学问”或学科门类,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它所具有的“明智”效果是其他任何学科都无以伦比的;还有人说,所有的学问最终都要归结为“政治”(不是政治学),因为,以上各个领域都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手段,而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因此,变革一切不适合时代潮流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现实顽疾”(包括性别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充满活力的内在动力。而要转变人们的认识,并将转变了认识付诸行动或实践,“教育”(不单指教育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不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只有在先进的理论和理念,以及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才能事半功倍地耕耘并收获——妇女与性别学科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所建设的正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在文史哲等传统领域以及许多新兴的学科领域,对以女人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的关注,无论中外和古今,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话题。

我们坚信:妇女与性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是一个“过程”,在当今林立的学科群落中她已起步,并踏上征程。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学科建设本身及其所产生的辐射效应,不仅重塑着人们的(性别)价值观,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而且也在生成着历史——生成着学科发展的历史,同时也生成着妇女的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历史。

(责任编辑:徐长恩)

① 胥莉《中国大陆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建设书评》,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② 参见谭琳《从研究到实践——推动政策和学术领域性别主流化的尝试》,载谭琳、孟宪范主编《他们眼中的性别问题——妇女/性别研究的多学科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③ 谢玉娥《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